

# 道德问题治理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龙静云



**【内容提要】**从历史的视角看，一个国家的良好道德及其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及其在历史上形成的深刻影响力，恰恰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价值和魅力的体现。但是，目前在我国道德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受到负面侵蚀和削弱。深入探讨和揭示导致我国社会道德问题产生的深刻原因，提出和采取有效措施对道德问题进行治理，从而形成一股向上、向善的力量和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增强社会主义道德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道德问题 道德问题治理

**作者简介：**龙静云（1957-），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9）。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他又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这些论述为我们从道德视角研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重要指导。

## 一、道德及其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元素

“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软力量）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由一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刚性力量铸就而成，而“‘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在世界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它在文化、政策或价值观念上的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其榜样，理解、认同其在国际社会的主张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sup>①</sup>。硬实力和软实力固然同等重要，但在信息化时代，软实力有时候比硬实力更能发挥作用。“过去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孟子早就在他们的著作里讲到软

\* 本文系作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13&ZD0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于盈：《约瑟夫·奈：从“软实力”到“巧实力”》，《南风窗》2009年第13期。

实力的概念，只是没有说出软实力这个名词”<sup>①</sup>。如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人无间”的说法就很好地阐释了以柔克刚，驰骋天下的道理。孟子提出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也说明了仅靠武力得天下和对外交往的局限性，强调赢得人心才能四方归服的真理。

道德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体系和思想意识，是文化诸要素中的核心要素，也是赢得人心的内在精神力量。因而，良好的道德及其影响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历经数千年流变，创造了仁者爱人、义以为上、为政以德、民贵君轻、民为邦本、诚实守信、敬老爱幼、修身自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知行合一的道德体系，并在实践中转化为人们坚强的信念和行为准则。这不仅彰显了整个社会所向往的崇高境界，也是历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美德。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所说的那样：“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今天，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断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我们的发展从来没有离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最具有同化力，因而也最具有软实力。儒家思想曾不断越出国界，传播到东南亚和欧美各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文化互相碰撞与融合，对其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会风貌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于18世纪上半叶就认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与中华文化相媲美。他指出：“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sup>②</sup>美国学者孟德卫对此评价道：“通过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努力，中国的道德和政治取代语言和历史，开始对欧洲社会产生重大影响。”<sup>③</sup>不仅如此，儒家文化对亚洲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新加坡21世纪五大理想”，即“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家庭凝聚，立国之本；人人都有机会；心系祖国，志在四方；积极参与，当仁不让”等等，正是儒家文化和价值观在新加坡的开花结果，同时也是推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由此可见，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中华文化对世界具有多么大的渗透力、同化力和深刻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崇尚的“讲信修睦”“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道德理念，也被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新的思想道德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交往中的软实力。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也被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所接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sup>④</sup>以此为基础，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公平正义”和推动建设“持之和

① 黄滢：《约瑟夫·奈：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环球时报》2014年1月5日。

②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蒋守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4页。

③ 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江文君、姚霏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④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主张，这既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道德优势，同时也是战略优势。

由上可见，一个国家的道德是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子。其中先进的伦理道德理念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与道德的渗透力，其思想家和优秀人物的道德理念与高尚品行对国内国际的示范力，其国民的道德信仰、道德实践能力和道德素质状况对他国人民行为的影响力等等，都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尺度之一。而中华传统道德的基本元素依然具有与现今时代相结合的持久生命力，故着力提升与中华传统道德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影响力，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道德问题：损害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负面因子

就当下的中国而言，一方面，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思想道德主流；但另一方面，“社会道德领域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sup>①</sup>。这已经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受到某些负面影响和削弱。

### 1. 道德功能弱化和拜金主义流行不断侵蚀着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以类似于法律的权威者的角色出现，其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十分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国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它也赋予道德一种类似于政治和法律的权威，道德在个体的内心深处也发挥了很强的控制功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道德曾经有过的地位和功能逐渐弱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及其强制性功能尚未及时补充上来，在此背景下，一些人的不道德行为以从未有过的力度表现出来，使文化软实力受到一系列负面因素的侵蚀。

### 2. 道德问题集中爆发和诚信缺失剧增削弱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道德问题集中爆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几乎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道德问题，二是诚信缺失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市民对于官方机构的信任度更低。2013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其调查结果证实，我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相对于2011年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中。诚信缺失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当前中国肌体最大的毒瘤，也是导致中国国际声誉受损和文化软实力下滑的罪魁祸首。

### 3. 道德底线失守与道德冷漠呈上升态势降低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所谓道德底线，就是保持人的尊严和良知，使人不与禽兽为伍的最后防线。人类文明共同的道德底线是尊重人权、尊重生命和公平正义。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出现的食品安全、包身工、残害人命、猎杀野生动物、官员腐败、弱势者的贫困加剧等问题，是对道德底线的失守。与底线失守相联系的是一些人在面对他人苦难和需要时出现的道德冷漠现象。道德冷漠尽管只是“善的缺乏”（或阿伦特所言的“平庸的恶”），但它在实质上是对恶的纵容，因而是恶的帮凶。道德底线失守与道德冷漠的负面后果之一，是抑制了个体的道德情感机制，导致社会的善行和美德无法立足。

<sup>①</sup>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视讯会议在京召开》，《光明日报》2012年5月15日。

#### 4. 特恶道德事件频发与社会戾气蔓延损害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根据道德行为动机、执行道德行为的手段以及行为完成的结果，可将道德问题的性质区分为基本恶、比较恶、特别恶三个层次。”特恶道德行为都具有“行为动机特别恶劣，行为手段极端残忍，社会后果非常严重等特点”<sup>①</sup>。如2013年6月发生的陈水总纵火烧毁公交车致47名乘客死亡的事件，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与特恶道德行为相联系的是社会戾气的蔓延。诚如阿玛蒂亚·森所说：“暴戾之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sup>②</sup>特恶道德事件频发与社会戾气蔓延说明，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基调不容乐观。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弱势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

### 三、揭示道德问题之源：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前提

探讨和揭示道德问题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我们推进道德治理，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前提。

#### 1.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是引发道德失范和削弱文化软实力最深刻的根源

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就是利己动机支配下的利润最大化，但这种认识其实是片面的。这些人眼中，只有“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因为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使按照完善的市场经济应有逻辑，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利，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合理的，因而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同样的权利，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市场主体的利己倾向引导到利他层面，并将利己与利他有机结合起来，合理追求个人利益又具有利他品格的人，才是市场经济应该塑造的现实人格。因为这些要求被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逻辑所扭曲，所以，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思想来予以矫正。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较短，要建立完备的市场制度还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在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的求利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还缺乏严格约束，不道德行为和违法行为逃避惩罚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对其他社会成员就会产生一种反向激励，“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也因此在一些人身上产生。应该说，这是导致道德问题不断产生最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 2. 法律的威严不足与法治建设滞后是造成道德问题产生和阻滞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社会，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因而法律应在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尊重而保持至上的权威性。这就是孟德斯鸠所强调的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都得到普遍支持与服从。只有这样，法律的威严才能得到守护，国家才能实行法治，在法治条件下的人才能趋向完美。但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尽管我们早已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法治的首要因素——法律的权威性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权在法下”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在公民对法律的敬畏感尚未普遍形成，法律的威严得不到坚定的守护时，一些人就敢于冒犯“天庭”，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恶劣的动物”。

<sup>①</sup> 龙静云：《社会排斥与报复性特恶道德问题及其治理》，《哲学动态》2014年第2期。

<sup>②</sup> 转引自窦宝国：《社会戾气的形成机制及化解路径》，《当代社科视野》2012年第6期。

### 3. 分配不公所带来的不满情绪加剧，不能不说是影响社会和谐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基尼系数是判断一国财富分配是否合理的标尺。它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A/A+B$ ）。基尼系数越接近0，收入分配就越趋向公平，反之，则趋向不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00年的基尼系数为0.412，2008年为0.491，2012年为0.474。10多年中基尼系数都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既带来了资源配置的盲目和浪费，也日益积累了社会的怨气。可以这样说，社会不公是一根“导火线”，它容易让人心态失衡，个性极端者还会因此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一旦爆发，这部分人也就不再遵循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而胡作非为。

### 4. 权力阶层的道德腐败及其负面示范是导致国家形象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权力腐败呈愈来愈严重之势，如“四风”的盛行，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损害了社会公正，削弱了人们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致富的意愿和能力，诱发了各种经济犯罪，还对国家的发展和执政党的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07年主政浙江时就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

### 5. 公民的法治意识的训练不足是社会公德匮乏和社会正气不强的深层原因

在现代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公民各种复杂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公民应依法享有各种法定的权利，国家亦有保护公民的义务，公民同时对国家和社会负有相应的责任。公民的权利是通过法律以及公民彼此之间的沟通、商谈来实现的，这也是社会整合的有效形式，而广大的民间组织又为公民的沟通、商谈提供了公共空间和网络。因为民间组织所开展的公益性活动有利于训练公民承担公共责任的法治精神，激发公民的互助互爱和社会协作意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彼此之间的交往已经突破了血缘和亲情等“熟人社会”而扩展到“生人社会”，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间日益拓展，公民的公德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但由于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公共精神训练不足，一部分人的公共意识和法治意识依然十分淡漠，这恰恰是产生道德冷漠现象和社会公德缺失的深层原因。

## 四、道德问题治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正是着眼于这一点，党和国家近年来在道德建设领域不断做出规划与部署。2012年5月，中央文明委在北京召开全国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视讯会议；随后，中央文明办公布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宣讲提纲》；党的十八大报告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又提出了明确要求。对道德问题治理提出有效的措施和对策，是现实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项重大举措。

### 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问题治理和提升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核，其建构和践行本身就是现实的文化软实力。而道德问题治理作为一种扶正祛邪，扬善抑恶的具体道德实践活动，其目的：一是纠正社会的各种脱序行为，扬善抑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普遍认同和遵守，社会秩序健康发展；二是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三是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良好的国际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方面，道德问题治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践行的有效途径之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道德问题治理结出丰硕果实的内在精神动力。

因而道德问题治理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扎实开展。

## 2.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落实道德问题治理和提升文化软实力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首先要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sup>①</sup>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和能力。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前提和条件，而高超的治理能力又能保障制度体系效能得到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高超，就会使政府行为和公众参与密切配合，从而顺利实现社会公正，保持社会和谐，降低各种风险。对道德问题治理的实际成效，也是判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尺度。因而道德问题治理，首先依赖于一个完备、正义且被敬畏的国家制度体系，尤其是法律制度。诚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和国家有效治理社会的内在条件，也是整个制度体系运行的关键。故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不断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提升人们对正义的法律和制度的敬畏感及精神信仰，是国家治理和道德问题治理的重中之重，也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和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条件。

## 3. 建构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以推进道德问题治理和提升文化软实力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等将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利益表达的渠道分为合法的和强制性的两种：个人与政治上层人物的联系，精英人物代理，大众传播工具，政党，立法机构，游行抗议等为合法渠道；罢工和阻挠，暴乱，政治恐怖及暗杀为强制性渠道<sup>②</sup>。合法而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是社会非理性情绪的“减压阀”。这是因为，非理性社会心态和报复性道德行为的产生往往与利益分享不公及利益表达不畅有密切联系。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表达行为就会以不可控的方式与力度发生。因此，政府要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使群众利益诉求获得顺畅表达，并将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可以这样说，当弱势群体获得畅通的利益表达，其诉求通过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而得到满足之时，也是社会非理性情绪逐渐抚平之日。

## 4. 增强党的软实力以引领道德问题治理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约瑟夫·奈说：“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反腐工作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党的软实力。”<sup>③</sup>这说明，党的软实力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涵。它是指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形象对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所形成的示范效应和巨大影响力。而要保持这种示范效应和巨大影响力，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要心存敬

<sup>①</sup>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sup>②</sup> 加布里埃尔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88-202页。

<sup>③</sup> 路克利：《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谈“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6日。

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由此成为人民心中的道德楷模，并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力。

#### 5. 发挥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作用以推进道德治理和提升文化软实力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间组织作用的发挥及政治道德操守和公民自律及道德风气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民间组织对社会具有重要的道德整合作用。因为民间组织通过服务性、公益性、志愿性的活动引导和教育公民，有利于训练公民的公共精神，培养公民的健康心智，增强公民的责任认知和道德情操。此外，民间组织还可以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各种道德实践活动，让人们在参与中实现道德情感的共鸣和道德素质的共同提高，这对于推动社会风气好转有积极作用。此外，大众传媒对善人善行的宣传和对恶人恶行的曝光，本身就是在传播先进的价值观念和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有利于促进社会正气的形成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 6.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推进道德治理和提升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sup>①</sup>推进对道德问题的治理，也必须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路径。这就要求把传统道德中的那些符合时代要求，有助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内容科学地继承下来，使其发扬光大。不仅如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道德成果进行批判性吸收。当然，与“双重吸收”相联系的是“双重批判”，即：既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也要批判西方个人主义及其破坏性后果，实现中西道德的互补与融合。此外，要倾听约瑟夫·奈所说的：“在信息时代，我们必须意识到，有时候真正的赢家不是看哪个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力，而是看哪个国家的故事讲得最动听。”<sup>②</sup>因而“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sup>③</sup>，是打造社会主义道德的国际影响力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
- [2] 中央文明办：《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宣讲提纲》，《人民日报》2012年6月5日。
- [3]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 [4] 沈壮海：《文化软实力及其价值之轴》，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 [5] 张国祚主编：《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编辑：张桥）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② 黄滢：《约瑟夫·奈：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环球人物》2014年1月5日。

③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软实力，实现中国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1日。